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涛 译

Kissinger

Vol.
3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侔 译

Vol.
3

上海译文出版社

**WHITE
HOUSE
YEARS**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目录

第三部分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从混乱到希望

- | | |
|------|-----------------------------|
| 917 | 第十九章 北京之行 |
| 984 | 第二十章 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 |
| 1051 | 第二十一章 偏袒：一九七一年的印巴危机 |
| 1141 | 第二十二章 联盟中的危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和经济对抗 |
| 1201 | 第二十三章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越南战争：逼河内就范 |

第十九章 北京之行

“李罗一号”：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中华民国*”“大使”詹姆斯·沈**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我的日记上记着，除沈剑虹外，我还会见了总统顾问唐·拉姆斯菲尔德、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印度大使 L·K·吉哈。我还同总统三次会晤，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来重新审查我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这之后记的是夜间在林肯厅同深思熟虑的总统会晤，与认真思考问

题的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会晤，共同策划战略问题。其内容多半是一些有关公共关系的无聊废话。此后一位记者要求会见，要我谈这些会议的内容。我请霍尔德曼代我接见，他同意了。“你撒谎也只能到此为止。”他承认说，这倒给道义上必须讲真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尺度。实际上，虽然我在转达六月二日中国人的信息时曾在那里和尼克松谈过话，但我们却极少在林肯厅开会，而且罗杰斯从来没有在场。我们几乎都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里谈论中国之行。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苏联的态度以及对越南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时间是花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上；当时我们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举行会谈的消息。我们决定，不管莫斯科怎样反应，现在将首先举行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

这次中国之行使尼克松在公共关系方面特别敏感起来了。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的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我不知道向巴基斯坦人或是中国人怎么讲才好。我们坚持保密已经引起了怀疑。我们不熟悉中国的保卫措施和他们内部商量的情况，如果再想指定谈判地点，那很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怀疑。因此我拖着不办，因为尼克松在给北京的信中可以讲明这一点——每一次信在发出之前他都是看过的，没有一次信建议在别的地点会晤。然而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还催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 这里指的是台湾。——译注

** 即沈剑虹。——译注

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他没有说明，宣布一位美国使者访问北京怎么能够不透露这位使者的姓名，除非这个人想在中国得到一个神出鬼没的名声。实际处理办法照顾到了这个问题。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我间接地向希拉利提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暂时不提这类请求，因为我们到北京之后情况怎么样谁都没有底，我们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

在我出发之前大约一星期，我把我的工作和我编集的文件拿给总统看。那厚厚一册黑皮书的代号叫作“李罗”，这是假借昔日访问中国的一个欧洲人的名字。尼克松仔细研究了开头的备忘录，并且亲笔在扉页上附注了意见。这本汇编开头是一个“意向篇”，它概述中国邀请我目的何在，而我们接受邀请又目的何在。

这个文件论断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降低台湾的地位；这可能在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间造成某种混乱；苏联将会面临新的复杂情况。也许真的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北京的基本目标是要美国退出亚洲；他们使我们出丑肯定会从那些强硬的革命派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北京方面不像是采取这种做法，这样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访问和邀请总统访问的那种局势不相符合的。我在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制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像中国的宣传机构（还有美国国内的批评家们）多年来所要求的那样，美国从亚洲撤出，这也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目的，因为美国撤出亚洲就会留下真空，而苏联人就会去填补。中国人一定会认识到，企图对我们施加压力就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从而加速美苏共谋主宰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最害怕的。我的备忘录推断说，虽然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越来越成为

他们的对手和潜在的威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继续同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对他们还有好处。

因此，我建议，既然是国际形势促成这次访问，我这次访问就要集中讨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讨论双方似乎都愿意加以肯定的目标的共同点。在这个范围内，我将讨论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取得某种形式的谅解，在我们双方的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减少我们在台湾的驻军，以及中国人对苏联的认识。我将谋求对印度支那问题能起某种缓和作用，并估计到，单是会晤和此后的最高级会谈这个事实本身就必定会使河内的士气大为低落。我们将谋求建立某种不依靠第三方的联系。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王国”的复杂的病态心理，认为我们是野蛮人，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我们也是可以容忍的。

此外，这本情况汇编还包括很长的一篇首次发言草稿，即对各种问题的会谈要点，以及大量的背景材料。我不能断定尼克松是如何彻底审查这个材料的；他通常的做法是集中注意开头的备忘录而忽视那些辅助性材料的。

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新审查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下的那些意见上。在这些意见中，他总是用那套一成不变的强硬的词句，而我每次衔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话打发我走的。他要我强调，如果迫不得已，他将“对越南转向强硬”。他认为我应当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接近”，表明我们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强调，美日继续保持同盟是减轻中国对日本的恐惧的最好办法。尼克松所担心的事并非都属于重大政策问题。他还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过希拉利转达的那个问题，即在总统任何访问之前“严格限制政治访问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国之前安排好粮食装运工作，这样就有助于缓和那些保守派对他的批评。他讨厌皮埃尔·特鲁多，为了发泄对他的不满，他谈到今后

同中国人的接触或者联系渠道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就是不能在渥太华。这些话大部分无非都是旧话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寄以希望的最高级会谈办好了，那些话尼克松是不会坚持的。尼克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纸面上写意见，但在我们见到中国人之前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

大约在晚上八点钟我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要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以此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在每一站，无论我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都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强调这是全球均势的需要。我告诉英迪拉·甘地，我们仍将像尼克松主义所宣布的那样，继续反对任何核国家无缘无故地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必须等待会谈中另一方的反应，了解这些话是否被认为是一个骗局，或者被理解为在情况许可下只能做出的保证。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仅要监督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掌管我们这伙人中分发的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做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做什么，总是特别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个行程中，我通过机密渠道收到华盛顿的信息，我的助手艾尔·黑格使我和白宫的焦灼情绪保持接触。霍尔德曼传达了总统的一项禁令，不许我们这伙人向国务院人员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我询问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原来，霍尔德曼只是表达总统长期以

来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忠诚感到不放心；总统认为国务院官员对那些泄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员助长这种同情。在我离开华盛顿前几小时，罗杰斯曾表明他从官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得到总统的授权，让乔·西斯科去中东一行，进行另一轮的谈判；其实当罗杰斯的备忘录到达白宫的时候，两位密使已经出发去开罗进行初步接触了。十分明显这是耍花招。我从西贡打电报说，这样去中东，只会加剧当前中东的紧张局势，应予以推迟。我建议，在我回来之后立即安排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中东问题。总统同意了 this 建议。

对于待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于我们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反而不着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我在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白宫了解到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我刚到达的时候将去北京访问，这一场虚惊，就非同小可。根据这一“可疑的事态变化”，就嘱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设法紧急通知我的“主人”（这是中国人的化名，是精心选定用来迷惑那些通讯人员的，因为在这一段中前面已经提到北京），要他们推迟赖斯顿的访问，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证”。我不能想象，走进北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电说：“至于赖斯顿，主人的决定不会因我的抗议而受到影响……我断定他们能保守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七月五日当我还在曼谷的时候，黑格告诉我伏龙索夫已经递交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苏联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复信。他们现在建议从原定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推迟到这一年较后的日期；即使到那时候，也还是有条件的，这要看正在进行的一些谈判的情况而定，并且“假定”在这期间不发生任何事情使局势复杂化。苏联人再一次无意中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他们机关算尽，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复信使我们摆脱了那种

复杂的局面，我们不必同时应付两个最高级会谈了。我们首先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不能责怪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给黑格打电报说：不要给伏龙索夫回信，驻波恩大使肯尼思·鲁斯在我回来之前应该寻找某种借口避免继续进行柏林谈判。我说，我认为苏联的复信“并非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与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可以晚些举行了，而且将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状况下举行。苏联的复信使尼克松大怒，并且想办法要报复。我劝他不要有任何被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不动声色”这一着，其结果很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赌气”了。我深信，未来十天将会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比我们任何正式的答复更有效。

华盛顿忧心忡忡，超级大国勾心斗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飞往伊斯兰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密电由法兰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划的。每次联系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许能愚弄五岁的孩子三分钟（我的化名是“首长”）。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我摆脱到处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我到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的缺点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时间定为七十二小时。当时，东巴基斯坦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大批孟加拉难民拥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待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我们的官僚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我们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而且完全为了打掩护而利用一个国家元首，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

我建议，我们公布一张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从七月八日到十日，大致相当于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到达之后我就声称腹痛，请大使馆诊所给我治病。我要装得越痛越好，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

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这样做还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我“病”了，我们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我呢？我们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我的指示呢？我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地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是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腹痛了起来，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则的话，到了巴基斯坦，岂不信誉扫地。）

我们的计划甚至还规定了万一被人发现之后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就要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明如下：“基辛格博士应中国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轰动，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在伊斯兰堡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在大使馆简单介绍情况，然后又出席了叶海亚及其高级官员的便宴。叶海亚由于那年十二月的印巴战争而被推翻下台，这是他下台以前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而我之到来是使他感到高兴的原因。叶海亚对这种警察迫强盗般的复杂而冒险的计划安排很感兴趣。他亲自检查了我秘密离开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们提供其政府所有的便利条件，并把他所信任的自己专用的飞机驾驶员供我们使用。与当时许多报刊的说法相反，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尽管他对我们殷勤接待，但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中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样宽厚的

对待。叶海亚是一个粗率、直爽而缺乏谋虑的军人，他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之后受到牵累，他对于那些事件，是既无经验又缺乏锻炼的。他铸成了大错。但他对我国帮了大忙；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正直高尚的。

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腹痛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我们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

在我离开之前，我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我，总统终于——七月八日——把我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我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在我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时，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我，要我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我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最后，还提醒我注意：梅尔·莱尔德在东京一次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利的谈话，说他不反对日本单独拥有核能力，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确认战略均势，这会鼓励日本启动核计划。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

一次。

七月九日凌晨三时半，我在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中起床，提早吃早餐。四点钟，我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和我在一起，还有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按照法兰的建议，我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我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七月六日、七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七月九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待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我们一行到来。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我自己那架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尔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它。

离开之前，我亲手拟了一个简短电报打给黑格，告诉他我知道什么时候公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最合适。我通知圣克利门蒂，中国人不仅派了三名领航员，而且还派了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陪同我飞北京。叶海亚总统告诉我，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很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我的电报最后说：“出发情况良好。”凌晨四点三十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两千四百英里，飞行时间四小时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五十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

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十四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我修改的日程表。

七月九日凌晨,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外交部把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为一个司。)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两千五百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西·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

* 艾尔·格雷科(El Greco, 一五四一年生于希腊, 一六一四年死于西班牙); 西班牙著名画家, 其绘画富宗教色彩。——译注

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在我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会晤时，这两位妇女总是在场）。第四个人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我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不仅指责我们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由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我们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我们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我们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后来，中国人不许保卫人员进去了。）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览紫禁城的时候都不释手。他们那副样子，好像八亿中国人无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能应付一样。

中央王国：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段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乔戈里峰——世界第二

高峰——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中国人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他们很客气地探问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为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感到可耻呢？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轻蔑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件事中国人并没有忘怀；在这次飞行中以及以后几天的很多场合，以及以后的访问中，都曾谈到这件事。我告诉章文晋，我此行的目的是宣告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我们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他说周恩来总理将准备探讨所有的问题。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时十五分，我们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前来欢迎我们的有叶剑英元帅，政治局中最年长的委员之一，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华，新近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后来是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后任外交部部长）；韩叙，礼宾司代司长（后来是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他曾在哈佛大学读化学，后来改了行。在检阅的时候，他曾经同毛泽东及埃德加·斯诺站在一起。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连接。花园的全貌